

法國學者看香港： 《世紀末，還是一個世界的末日？》

• 饒餘慶



Jean-Philippe Béja et al.: *Hong Kong 1997: Fin de siècle, fin d'un monde?* (Bruxelles: Editions Complexe, 1993).

近二十年來，關於香港的外文學術性著作不斷增加，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香港的「經濟奇蹟」：作為「亞洲四小龍」一份子，香港的經濟成就受到普遍的，特別是第三世界的讚美。其二是「九七回歸」。在正常情況下，香港回歸中國，不但是理所當然，而且也應是值得慶賀的事。然而事實是，過去十二年來，「九七問題」在香港觸發了信心危機、移民潮、港圓危機、中英爭拗……等等一連串令港人驚心動魄的事件。無論如何，香港正日益受到國際學術界和知識界的重視。

在關於香港的外文文獻中，絕大多數是以英文發表的。最近，五位法國學者合著了一本稱為《香港1997：世紀末，還是一個世界的末日？》(*Hong Kong 1997: Fin de siècle, fin d'un monde?*)的新書，填補了香港文獻中的一重大空白。從本書的參考文獻可以看出，九成以上的書目是英文。由此推斷，本書

很可能是關於當代香港的極少數的
法文著作之一。由於本書作者都是
對中港問題研究有素的法國學者和
報人，因此本書代表了法國知識界
對香港問題的看法。本書的標題也
生動地概括了一般人對香港前途的
心態。的確，長期以來，無論香港
內外，在談到香港的將來時，都難
免受到「九七大限」情結的影響。

本書篇幅不多，全書只有六
章，另有一從1840-1993年的香港
大事表和參考文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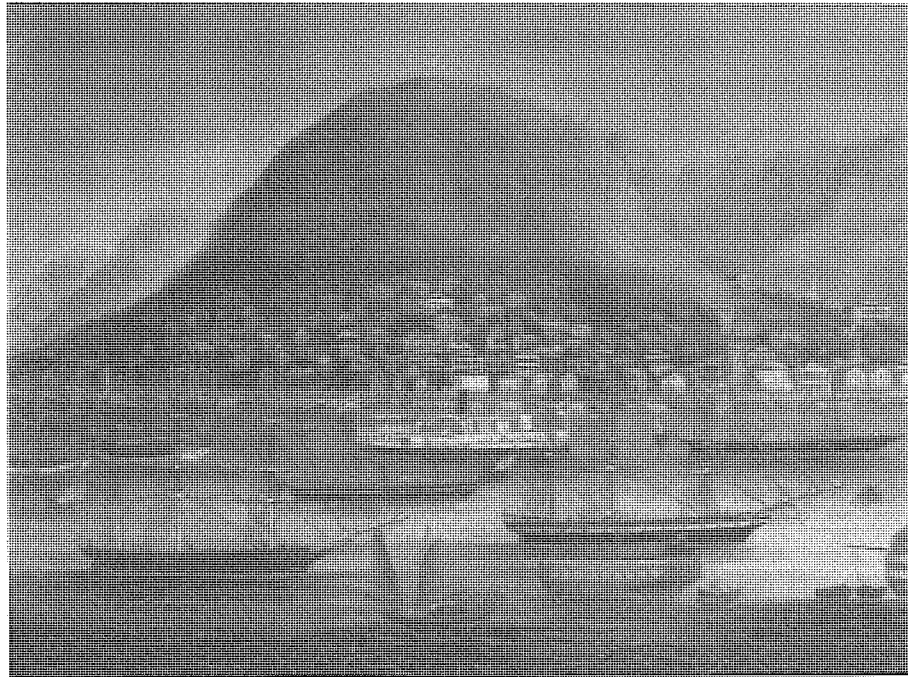
第一章是緒論，標題是〈從鴉
片氣味到現代化的芬香〉(“Des
senteurs de l’opium au parfum de
la modernité”)，由本書主編貝霞
(Jean-Philippe Béja)執筆。貝霞是
法國國家政治科學基金會國際研究
中心的研究員，曾與其他學者合著
《北京的地震》(*Le tremblement de
terre de Pékin*, 1991)。作者開宗明
義地指出，目前西方國家報章大事
渲染香港黑社會販毒至世界各地，
但卻忘記了現代香港是因英國強迫
中國接受鴉片而建立的。他扼要地
簡述了香港1840-1993年的歷史，
包括鴉片戰爭、三個不平等條約、
省港大罷工、國共兩黨對香港的立
場等。對中港讀者來說，這些當然
都是耳熟能詳的事實，但對法國或
法語系國家讀者而論，本章卻是對
香港問題的極有價值的客觀的導
論。作者也指出，香港在第二次大
戰後，已逐漸從一典型的英國殖民
地蛻變為難民和追求自由者的庇護
所。事實上，在國共內戰期間，不
少中共黨員，包括一些主要領導人
在內，均曾在港避難。1946-1949
年間，更有大批中共黨員、同路人

和民主人士在港公開活動。

第二章標題是〈北京的曲折反
覆〉(“Les zigzags de Pékin”)。作
者薄能(Michel Bonnin)是駐港的
中國研究信息中心主任，兼《中國
展望》(*Perspectives Chinoises*)的主
編。本章評述中國對香港問題的立
場和態度。作者指出，無論是國民
黨和共產黨，都認為香港殖民地地
位所根源的三個條約(1842年的〈南
京條約〉，1860年的〈第一次北京公
約〉，和1898年的〈第二次北京公
約〉)是不平等條約。事實上，「不
平等條約」這名詞，還是孫中山先
生首創的，但國民黨執政時，並無
任何收回香港的打算。事實上在當
時內憂外患的情況下，國民政府亦
無收回香港的力量。孫中山先生在
1923年對香港大學學生的演說中，
便慨嘆為何英國能在七八十年間，
能將香港這一荒島建設為現代化商
埠，而中國在四千年間也無法做到
(頁17)。第二次大戰將結束時，作
為戰勝國之一的中國，在美國總統
羅斯福的支持下，本有意收復香
港，但為英相邱吉爾所堅拒。邱吉
爾下台後，接任的工黨政府，非但
不放棄香港，反而先發制人，派英
軍搶先登陸，當時的中國政府亦無
可奈何。

中共執政後，人民解放軍本可
長驅直入解放香港，但1949年底，
解放軍抵達香港邊境後，便從未越
境半步。基本上說，1949年後的中
央人民政府，和1949年前的國民政
府一樣，一面不承認不平等條約，
另一面尊重現實，與港英政府保持
正常關係。即使在韓戰期間，中英
事實上成為敵國後，北京對香港並

貝霞指出，現代香港
是因英國強迫中國接
受鴉片而建立的。香
港在第二次大戰後，
已逐漸從一典型的英
國殖民地蛻變為難民
和追求自由者的庇護
所。在國共內戰期間，
不少中共黨員曾在
港避難。



上世紀的維多利亞港

未採取敵視行動。當然，文革期間，香港在1967年5月開始，也經歷了大陸文革式的暴動。但這場反英暴動主要是港共在「四人幫」示意下所挑起，至1967年末，周恩來重掌外交大權後，便迅速平息。

大致而論，1949–1982年期間，儘管大陸發生許多天翻地覆的動亂，北京對香港仍維持相當務實和審慎的政策。從中國的立場論，香港的地位既基於不平等條約，便不存在甚麼「九七問題」。香港可維持其現狀，直至「時機成熟」由中英解決這歷史遺留的問題為止。

但英國正式提出談判香港前途後，北京的態度發生了重大變化。北京堅持香港問題是中英兩主權國的事，不容第三者插手。在1982–1984年談判期間，北京自認為港人代表，強烈反對英方「三腳撻」的說法，漠視當時多次的民意調查，反而指責英方打「民意牌」。近年來，北京更有加強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的

傾向，除了堅持跨越九七事務須先諮商中方外，還反對香港的民主改革。作者認為，只有當充滿了反帝意識的老一輩領袖去世，致力於現代化經濟改革的年輕一代上台後，這種僵化的政策才望有所改變。「他們也許會採取較靈活的態度，為保持香港的繁榮和中國本身的利益起見，給予香港必要的自主權」（頁46）。

第三章題為〈倫敦的轉彎抹角〉（“Les méandres de Londres”）。作者雷魯埃(Jacques Leruez)是法國國家政治科學基金會國際研究中心研究主任，曾著有《英國的政府與政治》(*Gouvernement et politique en Grande-Bretagne*, 1989)。和上一章不同，本章主旨是分析英國對香港問題的立場和態度。英國是中共執政後第一個承認中央人民政府的西方國家，主要原因當然是要維護香港的地位。在韓戰期間，英國雖站在聯合國一邊，並對中國大

中共執政後，人民解放軍本可長驅直入解放香港，但1949年底，解放軍抵達香港邊境後，便從未越境半步，一面不承認不平等條約，另一面尊重現實，與港英政府保持正常關係。

陸實施戰略物資禁運，但另一面又極力抑制美國採取過激政策。據作者說，由於英國首相艾德禮(Clement Attlee)不斷向美國總統杜魯門施加壓力，終使盟軍統帥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將軍於1951年被撤職，停戰協議亦於1953年7月簽訂(頁50)。

在香港內部，英國則嚴守政治中立，嚴禁國民黨的政治活動，港府雖亦不時將過激的親共份子遞解出境，但一般而論，港府竭力避免任何開罪北京的政策或措施。

然而英國不像中國，總不能不承認三個條約的有效性。因此在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距新界租約期滿不到二十年時，英國在本國、香港，甚至國際工商界的壓力下，不得不向中國正式提出香港前途問題。1982年9月英相戴卓爾夫人訪京時，本來是以「三個條約有效」的態度與中方交涉的。因為中方反應強烈，英國在談判正式開始後，不再堅持三個條約，而改用「治權換主權」的策略。但中方態度出乎意外之強硬，連治權亦不肯讓步。英國是尊重法律的國家，新界租約既然在1997年6月底到期，中方如不肯延期，英國是無法可想的。因此，1983年夏季，特別是9月間爆發史無前例的港幣危機後，英國連治權要求亦予以放棄，中英終於在1984年在「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和「五十年不變」的原則上，簽訂歷史性的「聯合聲明」。以當時英方談判的弱勢而論，作者認為這一聲明已可視為英國的「外交勝利」(頁52-53)。

作者在分析1992年英國撤換前

總督衛奕信(Sir David Wilson)，任命彭定康(Christopher Patten)為港督事件時，認為主要因素有二。其一是彭定康(當時是保守黨主席)，他是保守黨競選勝利功臣，但他竟然競選失敗，因此馬卓安(John Major)首相亦有以港督為酬庸彭定康的責任。但更重要的是，當時英國政府認為英國對華政策長期以來受外交部「中國通」的支配，結果令人失望，因此亟思以一重量級的政治人物來代替職業外交家主持英國在香港最後五年的統治(頁58-59)。但作者並未提及怡和集團在「倒衛擁彭」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作者認為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在文字上雖未違反基本法，但在精神上卻與基本法大相逕庭(頁60)。

第四章題為〈不可能的民主化？〉(“La démocratisation impossible?”)，仍由主編貝霞執筆。這也是全書最長(共46頁)的一章。據作者分析，香港在80年代之前，是一個沒有政治生活的地方。第二次大戰後，首任港督楊慕琦曾有意實施憲政改革，在1946年底提出方案，將立法局改為全部民選。但這方案因工商界的強烈反對而擱置。1954年，英國殖民部大臣擬舊事重提，亦因上層精英反對而作罷。另一面，作者亦指出，香港居民大多數是第一代或第二代的逃避政治鬥爭與政治迫害的難民，因此對政治活動有一種本能的冷漠感和厭惡感。

1979年，前港督麥理浩(Sir Murray Maclehoze)訪京，獲鄧小平接見。他回港後，傳達鄧小平「請投資者放心」的話，但故意遺漏

香港在80年代之前，是一個沒有政治生活的地方。第二次大戰後，首任港督楊慕琦曾有意實施憲政改革，在1946年底提出方案，將立法局改為全部民選。但這方案因工商界的強烈反對而擱置。

〈區域性大都會或國際性中心？〉是本書唯一討論經濟與金融的一章，也可說是本書最樂觀的一章。作者對香港的經濟成就讚譽備至，甚至可說到了過度的地步。

了鄧的另一段話，即「中國將在九七年收回全部香港地區主權」。在此同時，麥理浩與英國政府作出兩大部署，其一是在香港設立區議會，開始以低姿態引進代議制。另一是策劃英國國會通過英國國籍法。但香港的真正政治生活，是在80年代初期才開始的。中英談判一方面固然觸發了信心危機，另一面亦激起了港人的歸屬感。港府1984年發表的代議政制綠皮書也引起港人參政興趣。因此，論政團體紛紛崛起，至90年代更演變為正式政黨。

作者對近二十年來香港政制與政治文化的變遷，包括廉政公署的建立、代議政制與政黨的形成、基本法的起草、1991年立法局直選和彭定康的政改方案，都有細緻的分析。他正確地指出，香港民主派所要求的只是高度民主與自治，但從未要求香港獨立，這是與台灣民主化運動最主要的差別。

但作者關於移民問題的看法，

卻是令人無法苟同的。例如，他指責英國在「六四事件」後，拒絕收容350萬英籍港人（頁87）。然而，任何國家都無法立即收容這一數字的移民。事實上，「六四事件」後港人鼓噪要求居英權，只是一種情緒上的發泄，其實極少港人願意定居英國。因此，英國1990年正式宣布給予5萬個英籍港人家庭居英權後，申請者不多，至1993年底截止時，仍有餘額。作者又批評港人大部分是來自大陸的難民，「九七問題」浮現後，又爭先恐後移民他國，但對越南船民卻採取敵視態度（頁91）。這是將「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混為一談。香港從未反對來自越南或任何其他國家的「合法移民」。但任何國家都無法無限地收容「非法移民」。香港以彈丸之地，更無此力量。美國過去亦常批評香港的越南船民政策，但以美國之大，資源之豐，在面對現實時，也嚴禁來自古巴、海地、墨西哥的非法移民。至於港人移居他國，完全遵守合法手

「九七」開始倒數，香港人真的有信心平穩過渡嗎？



續與程序。港人從未要求能非法移居任何國家。

第五章為〈中國關係〉(“La Chinese Connection”), 作者塞里爾(Jacques Seurre)是資深報人, 曾任法新社(AFP)駐北京記者。大約二十年前, 美國有一部名片“The French Connection”, 內容敘述馬賽如何成為販毒至美國的中心。本章標題故意模仿該片名, 旨在隱喻中國大陸已成為香港罪案的來源。中港邊境的走私、販毒、盜竊等非法活動, 確令人關注。不少非法移民變為黑幫, 也是事實。但中港警方正加強合作, 香港治安並無過度惡化的迹象。作者似有意誇大這問題的嚴重性, 但又提不出確鑿證據。本章可說是全書中最短最弱的一章。

最後一章題為〈區域性大都會或國際性中心?〉(“Métropole régionale ou place internationale?”), 是本書唯一討論經濟與金融的一章, 作者齊尼(Francesca Cini)是巴黎企業發展國際諮詢研究會的負責人。本章也可說是本書最樂觀的一章。作者對香港的經濟成就讚譽備至, 甚至可說到了過度的地步。例如他說「香港是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希望在東亞立足的外國投資者, 越來越把香港視為可代替東京的中心。在香港營業的國際性銀行, 比巴黎或東京還多: 560間銀行, 其中360間是外資銀行的分行」(頁117)。

如以外資金融機構的數目而論, 香港確僅次於倫敦和紐約。但金融機構數目只是評估金融中心的尺度之一。如以金融業規模、金融

市場的廣度與深度而論, 香港還不能與倫敦、紐約和東京相比。香港只能說是亞太區的三大金融中心之一, 和中華經濟圈(包括中國大陸、台灣、港澳, 和海外華僑在內的經濟體)的主要金融中心。

但作者對香港的經濟成長與結構、對外貿易、與中國內地(特別是廣東省)的關係、人才與資金外流、基建工程、以及香港在兩岸經貿的中介作用和亞洲商業關係的樞紐作用, 都有極詳盡的分析, 資料豐富, 洵屬佳作。

綜合而論, 筆者雖不能同意本書中的某些觀點與論據, 但仍認為這是一部關於當代香港的重要著作。正如前述, 本書填補了香港文獻中的一重大空白。筆者希望本書能進一步激發法國與其他法語國家讀者與學者對香港問題的興趣和研究。

法國人對國際事務與問題向來有其一套看法, 本書也不例外。法人與英人不同, 在香港問題上, 既無歷史包袱, 亦無既得利益, 其見解時有獨到之處。本書作者對書名中提出的問題雖未提供確切的答案, 但卷末的一段話是值得省思的:

長期以來, 作為英國殖民主義傲慢和中國的屈辱之象徵的香港, 今天卻成為了面對大陸官僚主義泥潭的資本主義活力之象徵。她明天會否成為中國人的政治模式?(封底)

饒餘慶 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教授。

長期以來, 作為英國殖民主義傲慢和中國的屈辱之象徵的香港, 今天卻成為了面對大陸官僚主義泥潭的資本主義活力之象徵。她明天會否成為中國人的政治模式?